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莽原里的朝花：《莽原》转型 与《朝花夕拾》的创作发生

张 炎

摘要：1926年，因自身内部人员观念的分歧，原本以“批评”为主的《莽原》周刊逐步转变为以“文艺”为主的《莽原》半月刊。再者，由于《莽原》半月刊重建与内部投稿人员的缺失，鲁迅计划在《莽原》半月刊刊载“旧事重提”写作。随着《莽原》半月刊风格的确立，专业性文学刊物的定位、温和的未名社同人以及回忆文章投稿的出现等促使鲁迅延长了“旧事重提”写作计划。在《莽原》半月刊的译介作品刊登中，《小儿的睡相》《小约翰》等作品影响了“旧事重提”的写作主题，使其转变为鲁迅的成长史。后因离开北平，不再担任《莽原》主编以及担任厦门大学教师的鲁迅重思自我身份，使得原本作为杂文自觉之外的《朝花夕拾》重回“杂文”命题。

关键词：鲁迅；《莽原》；旧事重提；《朝花夕拾》

对于《朝花夕拾》，学界一直将其看作“整本书”的作品集，^①这一方面源于《朝花夕拾》内部风格的统一，另一方面源于鲁迅作为《莽原》半月刊的重要编辑，将全部篇目发表于《莽原》半月刊。同人性刊物保证了投稿文章的风格统一、文学观念的相同，这也为解读《朝花夕拾》提供了一种外部路径。本文以《莽原》与《朝花夕拾》的关系为考察中心，探究刊物转变风格对鲁迅自身文学观念、文学写作的影响，刊物中同人写作及其投稿文章与《朝花夕拾》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朝花夕拾》内部的写法转变等问题。

一、《莽原》的转型 与“旧事重提”的诞生

1925年4月1日，鲁迅在《京报》上刊载了《〈莽原〉出版预告》，称“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由鲁迅先生

^① 陈思和：《作为“整本书”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两个问题——关于教育成长主题和典型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编辑”^①。而在同年4月24日,《莽原》周刊正式创刊并发布第一期。此时的《莽原》周刊同人并没有采取以往期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同人创刊词的做法,进而显示出文章风格与办刊走向。从《莽原》周刊第一期来看,其共发七篇文章,其中有两篇译文、五篇批评。而就本期鲁迅的文章而言,《杂语》奠定了《莽原》周刊的风格。鲁迅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②鲁迅有感于《新青年》刊物解散之后文学舆论场日益冗杂,声称要展开“神魔之争”,即急需一场与《新青年》同构的思想革新运动。此外,同年北平虽已形成以《语丝》《猛进》《现代评论》等为主要代表的思想革新刊物,但他仍计划创办以自己及其同人为核心的刊物。于是,鲁迅以其同人为核心,正式创办《莽原》周刊,进而推进具有自我意识的第二次“思想革命”^③。可在经过一月的办刊历程之后,鲁迅感叹: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④

在鲁迅看来,《莽原》周刊是以“批评”论介入中国舆论场域中,而作为主编的他收到的稿子大多还是小说。就《莽原》周刊发文情况来看,除创刊之前规定发表的译文外,鲁迅有意识地将第一期和第二期全部版面给了批评与杂文,其中便有名篇《灯下漫笔》等。但是从5月8日开始,鲁迅向许广平抱怨收到众多小说稿件之后,《莽原》便开始刊发北京同人的小说稿件,如废名的《河上柳》、台静农的《死者》等。这一举动也标志着《莽原》周刊内部供稿人与编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则是文艺稿件增多;二则是北京未名社成员的稿件增多。

在创刊之前,荆有麟求助狂飙社与鲁迅到《京报》办一种副刊。这也直接导致了早期《莽

原》周刊的主要供稿者为以高长虹为核心的狂飙社同人,以及以荆有麟、向培良、尚钺、王鲁彦等为代表的与狂飙社文学方向一致的文学同人。但是由于作为主编的鲁迅名誉过大,《莽原》周刊从第四期开始,供稿者数量大幅增多,庞杂的供稿者打破了以狂飙社为主的情况,其中便涉及以安徽作家为主的未名社成员。对于鲁迅而言,以高长虹为代表的狂飙社同人的身份意识契合了他对于第二次“思想革命”战士的定义。高长虹不仅和鲁迅一样,对《语丝》《猛进》《现代评论》等的办刊风格有所异议,还认同鲁迅“已从文艺而扩张到批评”^⑤的办刊主张,所以在《莽原》周刊时期,高长虹同人与鲁迅配合得还是很顺利的。

就《莽原》周刊发文情况来看,狂飙同人共发83篇文章,未名成员有22篇。可以说,高长虹同人获得了鲁迅给予的《莽原》编辑自主权,但是1926年,进入上海独自办刊的高长虹袒露自己与《语丝》时期的周氏兄弟在思想上差异很大,批评观念的不同也成为鲁、高二人分野的原因之一。对于狂飙社在《莽原》独大的情况,1925年8月,未名社成员选择接编《民报》副刊,发表“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⑥广告。这一“思想界权威”的广告事件直接成为鲁、高二人分道扬镳的导火索。高长虹看到这一广告后,便当面质询鲁迅,鲁迅的默而不答让高长虹更加反感。而从8月5日这一广告发出,对应着便是《莽原》周刊第17期之后,鲁迅大幅减少了对《莽原》周刊的供稿,而将自己的译文《小说的浏览和选择》、杂文《“碰壁”

① 鲁迅:《〈莽原〉出版预告》,《鲁迅全集》第八卷,第4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鲁迅:《杂语》,《鲁迅全集》第七卷,第77页。

③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3页。

④ 鲁迅:《25042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86页。

⑤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山西省孟县《高长虹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高长虹全集》第二卷,第19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⑥ 《民报十二大特色》,《晨报》1925年8月5日。

之余》《并非闲话》等转交《语丝》《猛进》。

可以说,这一广告的登出,一则标志着在狂飙社与未名社之间,鲁迅选择了未名社;二则预示了鲁迅的编辑思想从“批评”的《莽原》转向“文艺”的《莽原》。针对“思想革命”,高长虹强调“如想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①。他选择编辑《莽原》周刊只是想借助鲁迅等文化名家的舆论力量,并非想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先生一代”的“学生一代”。^②高长虹极强的自我意识也使得他想要唯独依靠青年来推动自己的狂飙思想革命。而在鲁迅看来,“思想革命”的前期工作在于培养思想革命的战士。而当鲁迅以培养思想革命战士或文明批评“打手”为目的去创办《莽原》之后,以《莽原》创办中期为界,他称:

至于大作之所以常被登载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饥荒”之故也。

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岂“骗小孩”云乎哉!^③

在编辑鲁迅看来,原本作为批评“打手”的狂飙社同人并没有改变文明、社会批评的现状,反而使得文艺更加虚伪,这也使得他重思以自我为核心的社团同人的身份。1925年8月,由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成员有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人。与此同时,1925年11月末,由于《京报》削减副刊,《莽原》周刊停刊。1926年1月10日,原本作为周刊的《莽原》挂在未名社下,转变为《莽原》半月刊。从《莽原》周刊与半月刊的创刊过程来看,尽管李霁野、韦素园、鲁迅等人的翻译贯穿了整个《莽原》始终,但是《莽原》周刊与《莽原》半月刊最大的不同并不在翻译与翻译家上,而是在“文艺”思想革命上。对于《莽原》半月刊的第一期,鲁迅十分看重这一重刊的战地,特地请林语堂写了《祝土匪》作为第一刊第一篇文章,而后紧接着便是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此时鲁迅并没有完全将《莽原》半月刊视为一份纯文

艺刊物,他还是延续原本将刊物作为自家阵地、“张起电器网”的做法。可在半月后的第二期,作为主编的鲁迅突转风格,除《〈华盖集〉题记》外,其余稿子均为文艺类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文学翻译、文艺理论等。尤其是文艺理论,在原本的《莽原》周刊中,其讨论与译介并没有受到重视,而在《莽原》半月刊办刊风格确定后,未名社成员积极推动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一直延续到《莽原》停刊。

作为主编,鲁迅完全可以延续《莽原》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定位,甚至还在《莽原》上发表《我的“籍”和“系”》等这类私人论战文章,但是鲁迅并没有这样选择。就1926年创办《莽原》时期的创作而言,鲁迅在其间写作了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死地”》《可参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等,以及杂文性质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等重要作品,这些杂文作品均没有发表在《莽原》上。与此同时,鲁迅又非常看重《莽原》半月刊的建设,还将自己的小说《弟兄》发表在上面,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没有将自己的杂文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

1926年复刊后的《莽原》半月刊被鲁迅视为一份专门指向文艺的刊物,^④鲁迅明晰的文类意识与编辑观念加强了这一指向。他写道:“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恍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⑤此处鲁迅非常清晰地指出杂文投给《语丝》、回忆投给《莽原》。那鲁迅为

①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山西省孟县《高长虹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高长虹全集》第二卷,第20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②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 鲁迅:《250709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03页。

④ 参见陈树萍:《在思想启蒙与文学建设之间——鲁迅〈莽原〉编辑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⑤ 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9页。

什么要写“旧事重提”？回忆为什么要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按照鲁迅的说法，他称：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①

此时他的记忆并不是很准确，《朝花夕拾》的前五篇写于北京，只有后五篇写于厦门。与此同时，在北京时期，鲁迅具有《莽原》半月刊的收稿权与编辑权。只有在鲁迅赴厦门之后，韦素园才全权打理《莽原》半月刊与未名社。显然，与《故事新编》的创作时间并提模糊了鲁迅写作《朝花夕拾》的创作动机。据周作人回忆，“鲁迅计划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②。鲁迅早期便有创办文艺杂志的计划，而在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刊物定位失败后，他改变了1925年对《莽原》的看法，即“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③。由此，鲁迅尝试重归期刊的专业功能。鲁迅固然很重视作为文艺杂志的《莽原》半月刊，但是就其写作而言，1926年创作的《野草》篇目发《语丝》、杂文发《京报副刊》《语丝》，本没有过多文艺作品的他在《莽原》第四期便断了供稿，这也使得鲁迅在面对自己的文艺杂志时，“文学鲁迅”重新破土。可以说，鲁迅为《莽原》半月刊的发展制定了“旧事重提”的文学写作计划。而当他完成六篇“旧事重提”之后，给韦素园写信说道：“从《莽原》十九期起，每期请给我两本……《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④可见《莽原》半月刊亦促使鲁迅完善了自己的“旧事重提”写作计划。

概而言之，刊物定位变动和内部人员的分裂使得《莽原》阵地逐渐转型，更为准确地说，1920年中期的鲁迅同人们无论在思想革命上，还是在文学建设上，均出现较大的意见分歧。由于北平舆论场的繁杂与《莽原》的青年化，作为专业性刊物的《莽原》无法将思想革命与文

学建设的任务合一，由此，1926年《莽原》出现了办刊风格的转变，这直接导致了革命语境中“文学鲁迅”的再现。作为主编的鲁迅为了自身刊物的定位与发展，以及清晰的文类意识、发文观念，促使他重新制定了1926年“旧事重提”的写作与供稿计划。

二、回忆的出现与《莽原》译作的互文

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同人离开《莽原》之后，《莽原》便少了许多泼辣的批评性文章，这并不意味着前期《莽原》由高长虹等人的批评占据主导。尽管《莽原》从“批评”到“文艺”的转向已经开始，但作为其主要编辑的鲁迅并没有放弃“批评”这一形式。以“旧事重提”系列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来看，鲁迅在《朝花夕拾》早期尝试了两种行文方式，而这两种行文方式直接奠定了《朝花夕拾》的写作。以《狗·猫·鼠》（1926年2月21日）和《阿长与〈山海经〉》（3月10日）的文本为例，这两篇文章的行文风格显然有较大差异。《狗·猫·鼠》的开头虽然是鲁迅定义下的“回忆”，但还是与他前期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语》《杂感》风格类同，起笔便具有议论或批评性质。而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起笔便是“人”。把《朝花夕拾》作为整本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二十四孝图》（5月10日）、《五猖会》（5月25日）、《无常》（6月23日）延续了《狗·猫·鼠》的风格，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9月18日）、《父亲的病》（10月7日）、《琐记》（10月8日）、《藤野先生》（10月12日）、《范爱农》（11月18日）则与《阿长与〈山海经〉》相同，均以记事、写“人”作为开头。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作品中，鲁迅有意识

①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54页。

② 周作人：《〔八一〕〈河南〉—〈新生〉甲编》，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8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③ 鲁迅：《250503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88页。

④ 鲁迅：《2610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67页。

地将议论、批评、杂文笔法等作为回忆的开头，乃至贯穿全文。而当他离开北平，自称一个人住在“四近无生人气”的厦门时，突然失去敌与友，由此停顿了近三个月的“旧事重提”写作亦发生了变化。鲁迅从冷静的《无常》转向自我内视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原本作为《朝花夕拾》前五篇附属客体的“我”成为后五篇的主体。真实的“我”的出现与“内面”的出现，使得《朝花夕拾》成为鲁迅五种“创作”中独具“个人史”意味的作品。而就《莽原》方面的原因来看，一则是上文讨论的期刊转向与“文学鲁迅”的再现；二则是同人身份的转化与《莽原》译作的影响。

首先，鲁迅称：“在未名社的你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所以作文，办事，都太小心，遇见一点事，精神上即很受影响……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①负责《莽原》半月刊的未名社同人自然没有狂飙社的泼辣，而未名社同人温和的性格亦使《莽原》半月刊的文学性逐步加强，甚至影响后期狂飙社的供稿。而作为未名社成员之一的鲁迅自然受到了《莽原》半月刊写作的影响。就鲁迅的发文情况来看，除了创刊时期，为了建设初期的《莽原》半月刊而推出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华盖集〉题记》《弟兄》《一点比喻》外，其余均为文学作品和译作。与此同时，作为主编的鲁迅不仅承担供稿、推销等任务，还为《莽原》的销量与走向而担心。当上海出现新的文学性刊物《幻洲》时，他称：

《狂飙》已经看到四期，逐渐单调起来了。较可注意的倒是《幻洲》《莽原》在上海减少百份，也许是受它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第一期，未卜后来如何。《莽原》如作者多几个，大概是不足虑的，最后的决定究竟是在实质上。^②

在此种实质的基础上，鲁迅收到了众多文学性作品，其中便涉及众多“回忆”性的文章。就早期刊发情况来看，鲁迅推出回忆性的台静农《奠六弟》、许钦文《表弟的花园》等，均为他的“旧事重提”系列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温和

的同人与刊物语境、自我文学的定位以及“回忆性”文章的出现都使得鲁迅《朝花夕拾》的诞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可鲁迅的回忆文章与台静农、许钦文、李霁野等人不同的是，其涉及关于“内面”与“儿童”的讨论。以《狗·猫·鼠》和《阿长与〈山海经〉》这两篇的写作方法作为开端之后，其余八篇各指向一种内面的话题，分别为伦理、创伤、民俗、成长、死亡、伪善、内视、革命。这也是鲁迅为什么将《朝花夕拾》推荐给增田涉作为了解中国情况的书籍，增田涉称：

《朝花夕拾》是回忆他幼年时代（以及留学日本的时期）和那周围情况的，其中特别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于其间的人的幼年的梦。这对于从外国来的，而且要学习中国事物的我，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的生活风习及其气氛，——我想他大约是从这样的用意出发的。^③

鲁迅足够自信外国读者阅读《朝花夕拾》之后，便可大概了解中国。而由于“内面”书写使得“与制度相对抗的‘内面’之制度性乃是问题之所在”^④，这也意味着《朝花夕拾》与同期创作的直接讨论“国民性”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一样，都指向鲁迅眼中的民族、中国问题，甚至是制度性的问题。

与内面问题相关，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又引出了“儿童”。在《狗·猫·鼠》中，鲁迅的回忆点是从“从去年开始，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⑤开始。可以发现，鲁迅写作“旧事重提”由头是从现实回忆开始，并不是从“童年”开始。而在第二篇中，鲁迅的隐鼠出现，进而引

① 鲁迅：《261205 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44页。

② 鲁迅：《261109 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10-611页。

③ [日]增田涉：《鲁迅印象记（节选）》，[美]史沫特莱等著，石孚等译：《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16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④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6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⑤ 鲁迅：《狗·猫·鼠》，《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38页。

出长妈妈。可以说,“旧事重提”从《阿长与〈山海经〉》才正式引入鲁迅的童年视野。1926年6月25日,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刊发了自己译介的有岛武郎《小儿的睡相》,文中写道:“有人说,小儿的睡相,是纯朴的……不可知的命运,将这样的重担,小儿已经沉重地,在那可怜的肩上担着了。单是这个,不是已经尽够了么?而人们,却还非因了互相憎恶,将更不能堪的重担抛给那一个小儿不可么。”^①而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讨论过类似问题。他写道:“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可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②在鲁迅看来,引入“儿童”便是要揭示如何让成人世界中的重担不再阻遏孩子世界的乐趣。可是鲁迅还是没有提出解决办法,而是借由《朝花夕拾》的写作提出儿童世界重担来源的命题。

而这些命题的来源直接来自计划刊登在《莽原》半月刊的《小约翰》。1925年3月,《未名丛刊》刊登了当年的出版计划,其中便有鲁迅译介的《小约翰》。次年,鲁迅写信给韦素园说:“《旧事重提》又做了一篇,今寄上。这书是完结了。明年如何?如撰者尚多,仍可出版,我当另寻题目作文,或登《小约翰》。”^③可见,鲁迅原本计划在《莽原》上刊发《小约翰》,并且《小约翰》的翻译过程是与《朝花夕拾》的写作过程重合的。将《小约翰》与《朝花夕拾》放置于同一视野中,便可以发现二者共同创造了自然世界、人类世界、鬼世界等。在《小约翰》中,约翰在初遇旋儿后,进入自然世界,等到上首赠予他能够获得幸福的锁匙,他要把锁匙藏起来的时候,小鼠特意提醒他不要藏在学校,而是藏在玫瑰中。显然,作者望·蔼覃塑造了两个完全区隔的世界。而在作者看来,童话中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最大的区别便是书,或者准确地说是知识。将知告诉约翰真实记载在书上,“因为真的书儿是应该能致大幸福和大太平的”^④,而当约翰从自然世界走进人类书房,先前被父亲阻止读书的他突感“我憎恶人类”“他学得越多,他的神往便越消失”^⑤。关于此种话题,鲁迅的《朝

花夕拾》亦是如此,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儿童获得了自然之书异常快乐,但是在《五猖会》中,他回忆道:“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⑥而在完整译完《小约翰》之后,鲁迅写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借儿童的口吻回忆:“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⑦可以说,此处呼应了望·蔼覃的观点,知识将儿童从自然世界带入人类世界,这不仅使得儿童告别了童年,也使得其中成人的重担暗暗压在了儿童肩上。

在《小约翰》中,童年与死亡成为儿童回归自然的两种途径。小约翰在觅书的过程中遇到了鬼世界中的“死亡”先生,其中的灵异自然让约翰陌生,但是在童话的结尾,约翰遇到了他童年最痛苦的事情,便是父亲的死亡。作者望·蔼覃讲述约翰因为远离自然,进入书房后,逐步憎恶人类。当面对父亲的死亡时,约翰感到无比的痛心,这时“死”先生告诉他,“你爱人类,约翰。你自己不知道,然而你永是爱了他们。成一个好人,那是较好的事”^⑧。而当约翰认识到父亲的死亡后,他终于回到自然世界中,见到他一直寻找的真实,即童话中的上帝。在《朝花夕拾》的叙述中,鲁迅在写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后,便写作了《父亲的病》,在其中的回忆中他还在回想“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⑨。鲁迅的感受恰恰与约翰相反,约翰在父亲的床边发抖、低声、哀哭,可鲁迅感到父亲死亡前呼吸得吃力,像犯罪似地想让他快点

① [日]有岛武郎作,鲁迅译:《小儿的睡相》,《莽原》1926年第12期。

② 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58页。

③ 鲁迅:《261120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23页。

④⑤⑧ [荷兰]F.望·蔼覃著,鲁迅译:《小约翰》,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八卷,第147、196、2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⑥ 鲁迅:《五猖会》,《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73页。

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89页。

⑨ 鲁迅:《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99页。

喘完,甚至在父亲弥留之际,自己无法像约翰那样完全真诚地恸哭、发声,这也是鲁迅为何想到此处,觉得自己犯了错一样。

就《朝花夕拾》而言,当鲁迅将自己的回忆公布在众多的读者面前,并且还要担心这一自己主办的刊物的发行量时,他不仅改易了回忆内容,还在每一篇中采取两种视点,一是儿童或青年鲁迅的视点;二是中年鲁迅的视点。对于中年鲁迅来说,思想革命与文学建设自然是回忆的主要意图,这也使得《朝花夕拾》的前五篇都带有社论的色彩,而当中年鲁迅回到“儿童”视点时,在译介《小儿的睡相》《小约翰》等这样的成人作品之际,鲁迅便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世界,后五篇的命题也与《小儿的睡相》《小约翰》中“知识”“自然”“死亡”等命题有关。

三、杂文自觉之外： 身份观念与“旧事”写作

因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朝花夕拾》的写作中断了近三个月。

鲁迅初定南下厦门的目的便是休息与教书养家。就1926年下半年的发文情况来看,他在写作了杂文性质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之后,一直到1926年年底,基本没再写过杂文,而其中主要发表便是《朝花夕拾》和译作。为什么在1926年6月,鲁迅在致李秉中的信件中,还提到“骂战”的文章还是继续做下去,但是在9月抵达厦门之后,便没有再写作杂文了?鲁迅在《厦门通信(二)》中谈道: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

同的两条路。^①

在此处,鲁迅袒露自己的困境便是教书吃饭与作文之间的两难。首先,1926年,鲁迅离开北平使得他失去了教育部的固定工资,这也意味着原本拥有体制内人员与特聘讲师身份的鲁迅在进入厦门大学之后,失去了文教结合的保障。由此,鲁迅向好友说明自己作文的窘境,不乏受到生计上的压力。其次,由于《莽原》半月刊挂靠北平未名社,离开北京的鲁迅将《莽原》半月刊的收稿权、编辑权等都交付给韦素园,这也使得在进入厦门大学之后,原本拥有体制内人员、北平高校讲师、《莽原》编辑等多重身份的鲁迅只剩教师这一种显性身份。然而,原本接受好友林语堂的邀约,赴厦门大学“休息”的鲁迅不仅感到编订教材、教书生计的压力,还面临着重新思考“教师”的身份问题。而后,他致信许寿裳,写道:“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②他发现学校内部的教师职员并不如同之前所想,反而面目可憎。而就任课教师来说,厦门教师对于国学复兴的热衷,以及对于《现代评论》的追捧,也使得原本习惯北平思想革命气息的鲁迅重新反思“教师”这一身份,进而称“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③。

对于学校与教师的重思,不仅促使鲁迅“弃教从文”的发生,还对《朝花夕拾》的主题产生了影响。尽管厦门鲁迅不是《莽原》半月刊的全权负责人了,但北平未名社仍“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④,他还是再拟“旧事重提”的写作计划。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开始,厦门鲁迅在自己的“旧事重提”写作中,完整回归到自己的成长轨迹中来。由此,鲁迅写作《琐记》来交代这段经历。文中提到:

-
- ① 鲁迅:《厦门通信(二)》,《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1页。
② 鲁迅:《260907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42页。
③ 鲁迅:《270112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3页。
④ 鲁迅:《26102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90页。

“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①正是现实中厦门大学的校长秘书掣肘林语堂,对来闽的孙伏园等四人也不及时放发聘书等行为,使得鲁迅用南京学堂的回忆暗讽北平教育部、厦门大学教育职员。

在《琐记》的写作基础上,鲁迅紧接着写作了《藤野先生》。按照《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这三篇的写作惯性,鲁迅回忆中的主体本是他自己,但是由《藤野先生》开始,至《范爱农》结束,鲁迅回忆中的自我与他者平分了文章的篇幅。在《藤野先生》写作之前,《莽原》半月刊由于狂飙社与未名社的决裂,供稿出现了问题。鲁迅致信许广平抱怨:“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他们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我实在有些愤怒了,我想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他们再争夺什么。”^②而原本鲁迅创办《莽原》意图在于“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③,然而由他主导、青年创办的《莽原》却因为青年之间的矛盾而面临停刊的危机,这不仅让鲁迅重思自己原本的青年观念,还让他进入厦门之后,以教师鲁迅的身份思考青年如何面对教师的问题。在此语境下,鲁迅将《藤野先生》一半以上的篇幅留给了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中,鲁迅不仅在怀念作为教师的藤野先生,还在内视作为教师的自己。由此,鲁迅才会在《藤野先生》的结尾写下:“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④可以说,《朝花夕拾》中每篇的结尾,都表明了鲁迅写作此篇的核心与目的。而在此处,厦门鲁迅失去敌友,又因为教师环境的困厄,让他没有时间投身到杂文写作中。而藤野先生的模样则让鲁迅重回日本学习的历史语境,同时拥有继续写作杂文的想法。

鲁迅在此不仅表现藤野先生之于自己的意义,更意在思考教师与“学生一代”的行动所指。

鲁迅决定将《莽原》半月刊办至24期后,便不再继续下去。就此半月后,鲁迅写完了“旧事重提”系列的最后一篇《范爱农》。是年十二月,鲁迅致信韦素园称:“《范爱农》一篇,自然还是登在24期上,作一结束。来年第一期,创作大约没有了……我决计于学期末离开,或者可以较有活气。那时再看。倘万不得已,就用《小约翰》充数。”^⑤他将《范爱农》作为《莽原》半月刊的结束,这既标志着1926年“旧事重提”写作的完成,也标志着鲁迅主导的《莽原》半月刊的结束。而在此之后,1927年的《莽原》便成为未名社的内部刊物了。

对于《范爱农》,鲁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在1933年编撰《鲁迅自选集》时,鲁迅将《朝花夕拾》中的《狗·猫·鼠》《无常》《范爱农》三篇选入,而在1934年致信增田涉时,他又指出:“《范爱农》写法不佳,还是割爱为好。”^⑥与此同时,原本作为专业性文学刊物的《莽原》在受到广州革命的影响后,刊载了画室翻译的昇曙梦的《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等革命文章。翻阅《范爱农》一文可以发现,鲁迅引入了此前“旧事重提”系列中未曾出现的“革命”母题;基于此,这篇文章的主体已从鲁迅转向范爱农。鲁迅在文中写道:“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⑦“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⑧在日本时期,鲁迅便发现范爱农与革命有相悖之处,等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他又失去了教职,回到了日本时期

① 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04页。

② 鲁迅:《26102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90页。

③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页。

④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19页。

⑤ 鲁迅:《261208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48页。

⑥ 鲁迅:《341202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328页。

⑦⑧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22、327页。

的状态。而回到《朝花夕拾》整本书中,其他篇目都没有讨论过“革命”这一话题,唯有《范爱农》涉及知识分子的革命问题。据周作人回忆,“在那同乡会的论争上,鲁迅与范爱农的立场乃是相同的,不过态度有点不同”^①,不主张发电报的日本范爱农反而是激进派,但是在《范爱农》中,鲁迅改易了自己的真实立场,称自己反对范爱农,支持发电报。可见,此刻的鲁迅倒转了自我的身份、将原本的真实回忆转变为隐微虚构。当厦门教师鲁迅体会到失去教职的范爱农的情况之后,他并没有立即将自身纳入“革命”的叙述之中。但需要指明的是,《范爱农》开裂了《朝花夕拾》中鲁迅避谈革命的舒适圈。鲁迅有意识地模糊了自我留日期间的革命倾向,一方面在安稳的《莽原》中隐藏私人性;另一方面重新回溯留日期间的革命经历与好友的生命历程。可以说,鲁迅写作《范爱农》不仅意味着“旧事重提”的结束,文学《莽原》办刊的结束,还标志着1926年杂文自觉之外鲁迅写作的结束。在《藤野先生》《范爱农》等杂文自觉之外写作的铺垫下,鲁迅重思“弃教从文”的可能性以及自己所偏好的“骂战”文章。

归总而言,由于离开北平,鲁迅将《莽原》半月刊全权托付给以韦素园为主的未名社成员,由此,厦门鲁迅不再在编辑鲁迅、教师鲁迅之间互换。而当鲁迅将大量时间花费在编订教材上之后,原本作为休憩之地的厦门,却因为人事的原因让鲁迅感到生计的压力,进而使得在两地创作的《朝花夕拾》也随着他的心境改变了创作主题。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与稳定的《莽原》内部形成一种张力,在此种张力下,鲁迅得以在隐藏私人性的基础上,从原本的回忆写作重归具有杂文意味的写作。需要指明的是,《朝花夕拾》整本书完成于1926年,伴随着文学《莽原》的建立与落幕。其间,北平鲁迅在文学《莽原》中寻得杂文自觉之外的空间,而厦门鲁迅却在《藤野先生》《范爱农》中反思了“弃教从文”之后的杂文书写。

结 语

1927年5月,鲁迅在开始编订《朝花夕拾》

时写道:“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②鲁迅将“旧事重提”改名为《朝花夕拾》,这也使得原本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的回忆文章中的私人性被抹除了,原本为重建《莽原》而重回自我回忆的意图也被遮盖了,他回溯1926年写作“旧事重提”的过程,还是认为自己的回忆是不能够给文章增色的,与此同时,他也袒露1927年心中的回忆已无法转为《朝花夕拾》类型的文章了。

《莽原》半月刊的文学性为鲁迅制定“旧事重提”写作计划奠定了基础,且由于他具有《莽原》半月刊的编辑权,这也为他的私人写作提供了保障。原本持续为《语丝》等刊物供稿的鲁迅无需在《语丝》等面前书写真实的自我,乃至脆弱的自我、儿童自我。这不仅让鲁迅在1926年完成了文学建设与思想革命的目标,还让他在杂文自觉之外,开辟了内面性质的散文写作。《莽原》之于《朝花夕拾》,不仅仅是后者刊发的载体,更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与影响源。通过《莽原》,鲁迅以期刊建设的目的重归新文学本身,再以审美的角度回到社会认知与自我回忆之中。可以说,将《朝花夕拾》放置于作为其母体的《莽原》中,其间鲁迅的意图才得以完全显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建构中的‘史传传统’研究”(25CZW06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

① 周作人:《〔四三〕〈范爱农〉》,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二卷,第44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②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35页。